

从闽北到莫斯科的陆上茶叶之路^{*}

——19 世纪中叶前中俄茶叶贸易研究

庄 国 土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18 世纪至 19 世纪末期的陆上茶叶之路,从福建北部的武夷山区延伸到莫斯科,全程超过 4.5 万里。陆上茶叶之路以恰克图为中心,中俄商人“彼以皮来,我以茶往”。19 世纪中叶以前,这条贯通欧亚的陆上茶叶之路的贸易一直由山西商人主导。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以武力推动对华商务扩张,外商在华享尽各种特权,华商在与外商竞争中纷纷败北,执塞外贸易之牛耳的山西商人也不得不退出对俄茶叶贸易,茶叶之路为以沙皇政府为后盾的俄商垄断。

关键词:武夷山;莫斯科;茶叶贸易;山西商人

中图分类号:K207;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1)02-0119-08

在 18 - 20 世纪初西方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茶叶一直处于支配地位。西方贸易商认为:“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1](P163) 西方贸易商寻求茶叶所带来的巨额利润,使中国与西方的直接贸易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也使西方对中国的商务扩张演化为武力征服。鸦片战争的爆发,即是西方在传统的白银换茶叶(中俄贸易则是皮毛换茶叶)无力为继而强迫中国接受鸦片引起的。可以说,茶叶贸易引发的大规模中西交流与冲突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国社会被迫卷入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开始痛苦的近代化历程。

18 世纪以降到 19 世纪末,大规模的中西茶叶贸易可分为海路贸易与陆路贸易,以海路贸易为主,主要消费市场是西欧与北美。茶叶陆路贸易以俄国市场为主。本文探讨 19 世纪中叶以前陆路输俄的中国茶叶贸易及中俄关系对茶叶贸易的影响。

一、18 - 19 世纪中叶的中俄茶叶贸易

虽然早在公元前 2 世纪中国人就开始种植茶树,但直到 16 世纪中叶才为西方人所知。

^{*} 收稿日期:2000 - 12 - 13

作者简介:庄国土(1952 -),男,福建晋江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关于鸦片战争爆发的经济原因,参见庄国土:《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 - 1840 年中西贸易结构》,《中国经济史》1995 年第 3 期,第 64 - 76 页。

1559年,威尼斯商人 Gambattista ramusio 在其出版的《航海记》(Navigazione et Viaggis)中首次提到茶叶。西方最早获得茶叶则是通过海路。1606年,荷兰人首次从印尼群岛的万丹将茶叶输往欧洲。[2](P19)与海路茶叶输往欧洲相比,陆路茶叶输俄之早几乎毫不逊色。1616年,拟出使中国的俄使泰乌涅茨(Tyumenets)和彼得罗夫在中亚的阿尔丹汗国(Altan khan)获得中国茶叶,并将其作为礼品于次年带回莫斯科呈献给沙皇。[3](P8)然而在此后20年,茶叶似仍未被俄国人提及。这也毫不奇怪,中俄之间尚无直接或间接贸易关系,此间也无任何中国商品运抵莫斯科。直至1640年,俄使瓦西里·斯达尔科夫从中亚卡尔梅克汗返回莫斯科,带回茶叶200袋(约240公斤),奉献给沙皇。[4](P116)第一次直接从中国带茶叶到俄国莫斯科可能是在1660年。1658年3月,俄国派遣使臣佩尔菲利(Perfilev)来华。与其前任使臣巴依科夫(Baikov)一样,清廷仍令其行觐见皇帝的叩跪礼节,俄使仍不依从,故没有受到清朝皇帝接见,也未完成其寻求建立避免阿穆尔地区冲突和从事和平贸易的使命。然而他在北京受到较好的接待,他呈献给中国皇帝的礼物包括40张黑貂皮,13张银狐皮,4匹布和一件白鼬袍。清廷回赠沙皇24匹丝绸,1磅多白银,雪豹、海狸、海豹皮各3件,还有一些缎子和3磅茶叶。[3](P11-12)他应在1660年把包括茶叶的这些礼品带到莫斯科。

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Treaty of Nerchinsk),该条约规定,“一切行旅有准往来文票者,许贸易勿禁”,[5](卷10,P55)此后中俄边界贸易逐渐活跃。但中国茶叶输俄数量增加缓慢,与西欧(尤其是英国与荷兰)在18世纪20年代以后开始大量消费中国茶叶不同,直到18世纪末,茶叶开始成为俄国全国广泛消费的饮料。

在整个18世纪,俄国进口的中国货物一直以中国棉布和丝绸为大宗。中国棉布不但为西伯利亚人所需求,也为欧洲部分的俄国人所青睐。[6](P355)18世纪末以前,俄国市场上消费中国茶的主要是西伯利亚人。输俄茶叶以砖茶为主,西伯利亚人混以肉末、奶油和盐饮用。中国茶广为西伯利亚人喜爱,乃至被视为通货:“砖茶在外贝加尔湖边区一带的居民当中饮用极广,极端必要,以致往往可以当银用。在西伯利亚的布里雅特人等土著民中,在出卖货物时,宁愿要砖茶不要银,因为他们确信,在任何地点都能以砖茶代替银用。”[7](P144)在1762-1785年间,每年约4607担红茶、3387担绿茶输往俄国。直到1792年,输俄茶叶货值才第一次超过中国棉花的货值。当年,茶叶货值达54万卢布,占当年输俄中国货物总值的22%。到1802年,输俄茶叶货值达187万卢布,占输俄货值的40%。[6](P358-359)

18世纪末以后,中国输俄茶叶数量激增,从1798年的约1.3万担(Piculs)到19世纪30年代的约4万担,增长2倍以上。到1839年,更达54486担。[8](vol. 14, P2-3)

这一期间,俄国输入中国茶叶的增长率超过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茶叶需求增长。以这一期间基本垄断中国茶叶海上输出的英国东印度公司(EIC)为例,179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购买茶叶15.7万担,到1930年,购买中国茶叶22.9万担,增长不到1倍。

这位威尼斯商人所知的“茶叶”并非目睹,而是从一位到过中国的波斯商人处得知。Thema Thee, p. 13, Museum Boymans van beuningen, Rotterdam 1978.

关于欧洲1720年代以后大量消费茶叶的状况,参见:Zhuang Guotu, *Tea, silver, Opium and War: The International Tea Trade and Western Commercial Expansion Into China in 1740 - 1840*, Chapter 3,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1993.

表 1 1758 - 1839 年中国茶叶输俄数量表

年份	数量(担)	年份	数量(担)
1798	12 729 *	1799	14 178 *
1800	18 931 *	1802 - 1810(年均)	20 383
1811 - 1820(年均)	25 985	1821 - 1830(年均)	38 701
1839	54 486		

* 从恰克图购买的数量。

资料来源: Foust , pp. 358 - 359 ; Sladkovskii , pp. 61 - 68 .

表 2 1799 - 1833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
从中国进口茶叶数量

年份	数量(担)	年份	数量(担)
1799	157 526	1811	160 692
1822	218 327	1833	229 270

资料来源: K. N. Chaudhuri , 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 p. 583 ; Cambridge 1978 ; Pritchard , pp. 395 - 396 .

虽然俄国的欧洲部分与中国的直接贸易早在 17 世纪就已开始,但大规模的商队贸易则是当茶叶成为重要商品之后。尤其在 18 世纪后期到 19 世纪末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之前,茶叶贸易一直是中俄陆路贸易的核心商品。在莫斯科和福建之间这条长达 4 万多里的陆上茶叶之路上,中俄商队络绎于途,共同经营蔚为壮观的茶叶贸易。

二、茶叶输俄的贸易路线和贸易商

在 18 世纪中叶以后茶叶成为输俄大宗商品时,输俄茶叶的主要品种是砖茶状的红茶和绿茶,叶状的绿茶在 18 世纪末以后数量已微不足道。输俄茶叶从茶区装运,由陆路的商队转贩,行程数万里,耗时近 2 年,故需制成砖状,便于装卸和避免变质。茶叶的砖块大小不一,“重量为二又四分之一磅至四磅。在泡冲之前,先剥去砖块之边缘,再捣碎至适当大小”,“经三星期之干燥,即告完成。……均包于纸,并装竹篓中,每篓 80 块,净重 200 磅。”[9](上卷, P165)

输俄茶叶以红茶为大宗,多是福建武夷山出产,由山西商人前往福建采购。输俄武夷茶的运输路线是经江西转河南运往张家口,而非经鄱阳湖,顺长江入大运河至北京的传统南北商路和贡道。其理由是:第一,北方地势平坦,陆运较运河水运快捷。山西商人来武夷贩茶为首春茶季。茶事毕后运至张家口,至少在 5000 里以上,再由张家口运至恰克图,约 4300 余里。若以日行 80 里计,路途需 130 天。运至恰克图后,可在 7 - 8 月由俄国商队贩运回国,否则 9 月以后,西伯利亚冰封雪冻,将耽误至来年初夏。第二,输俄茶叶另一主要部分是湖北的砖茶。清乾隆年间,山西大茶商王玉川、巨盛川到鄂南羊楼洞设庄收制边茶,每年生产砖茶近 80 万公斤。[10](P77) 闽茶入鄂,抑或部分加工为砖茶,抑或与鄂茶会合,一道经河南运至张家口。茶叶运到张家口后,再经库伦(乌兰巴托、Urga & Ulaanbaatar)运到恰克图(Kyakhta)交割给俄国商队,俄商再从恰克图携带茶叶往莫斯科,其走向与今西伯利亚铁路大致相同。

张家口为山西茶商根据地。光绪六年(1880 年)十月祭酒王先谦奏折中曾提到:“从前张家口有西帮茶商百余家,与俄商在恰克图易货,及俄商自运后,华商歇业,仅存 20 余家。”[11](卷 24, P14)“俄商自运”,指的是 1862 年签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俄商自己可以到内地购茶,山西商人失去对俄华茶主要供应商的地位。

自张家口到恰克图的商路分东西中三条:“东路自乌兰坝入察哈尔正蓝旗界,经内札萨克西林郭勒盟之阿巴噶王、阿巴哈那尔贝子等旗游牧。入外萨克车臣汗部落之阿海公旗游牧,经

关于这一时期福建武夷山外销茶生产与运销,参见:庄国土《鸦片战争前福建外销茶叶生产和营销及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9 年第 3 期。

达里冈爱东界,入车臣汗部落之贝勒等旗游牧,达于库伦,由库伦方达恰克图,此东一路也。西路自土默特旗翁根坝、河洛坝,经四子部落沙拉木楞、图什业图汗旗,至三音诺彦旗,分为两路,其一西达里雅素台科布多,其一东达库伦,由库伦达恰克图,此西一路也。中路自大境门外西沟之僧济图坝,经大红沟、黑白城子镶黄旗牛群大马群、镶黄旗羊群各游牧,入右翼苏尼特王旗,经图什业图汗旗车臣汗部落之贝勒、阿海公等旗游牧,渡克鲁伦河达库伦,方达恰克图。”

[12](卷 66, P8) 输俄茶叶应是走中路,不但因为其路程最短,而且是张家口至库伦的传统商路。

自张家口至恰克图 4300 余里,多穿戈壁沙漠和蒙古高原,气候恶劣,地旷人稀,是整条陆上茶叶之路最为艰难的路程。到达恰克图以后,主要与俄商交换皮毛,“彼以皮来,我以茶往”。

[13](卷 37, P12) 这种陆路运来的茶叶“因陆路所历风霜,故其茶味反佳,非如海船经过南洋暑热,致茶味亦减。”[14](P8)

俄国商队从莫斯科出发,先往东北雅罗斯拉夫尔(Yaroslavl),再向西经乌斯提乌格(Ustyug)、菲尔克提乌尔(Verkhoture)、土里雷乌克(Turiwk)及托博尔斯克(Tobolsk),再从伊尔提斯(Irtysh)河边的塔拉(Tara)到叶尼塞,再从陆路沿贝尔加湖南岸到色楞格河(Shilkhta River),最后到达恰克图。整个行程约 17 600 公里。商队通常有 200 - 300 匹驼,每匹驮 4 箱茶叶共 2400 磅,每日行程约 40 公里,从恰克图到莫斯科约需 16 个月。[9](卷下, P54) 相比从张家口到恰克图需穿越戈壁沙漠和高原,从莫斯科到恰克图商路则主要利用平原地带的水陆运输网络,虽路途遥远但地势平坦,故其艰难程度反不及从张家口到恰克图的路程。

张家口是中国商人塞外贸易的货物集散地与贸易中枢,南货汇集于此,再经各条商路分流到塞外各处。福建输俄茶叶也先屯于此地,再运往恰克图。塞外货物如皮毛等,也汇于张家口再分贩北京及南方各省。主导张家口贸易的是山西商人,清初为内务府采买皮货的张家口八大商家,也都是山西人:“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定鼎后,承召入都,宴便殿,蒙赐上方服饌。自是每年办进皮张,交内务府广储司。”[15](卷 50, P10) 充当内府采买,不但利润甚丰,更重要的是确立一种准官商的地位,这使他们与其他商帮竞争时具有政治优势。

19 世纪中叶以前,中俄贸易主要在恰克图进行。在恰克图的中国商人的主体也是山西商人,即所谓的“西客”或“西帮茶商”。何秋涛记载,“其内地商民至恰克图贸易者,强半皆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毡片等物。”[13](卷 37, P15 - 16) 山西晋中汾河以东民俗尚贾,早在南北朝时,“河东俗多商贾、罕事农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识耒耜”。[16](卷 15, P573) 平遥、忻县、太谷历代名商辈出。时至清代,口外贸易几为山西商人所垄断,南货贩北,也多由山西商人把持。诚如刘选民《中俄早期贸易考》所载,“自内地赴恰克图贸易之商人,泰半为山西人。然山西人之足迹并不仅限于恰克图,即新疆、满、蒙诸地之贸易,鲜不为彼等所垄断。”[17](P104) 武夷山输俄茶叶更是由山西商人经营。清代武夷山人袁干的《茶事杂咏》载:“清初茶叶均由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至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18](P81)

山西商人的交易对手主要是俄国官商,俄国私商仅在 1730 年以后才开始担任对华贸易的主导角色。1697 年,沙皇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颁令,貂皮、狐皮贸易仅能由政府经营。为了控制对华贸易,沙皇在莫斯科设立西伯利亚公署(Siberian Office),组织和保护政府对华商队

贸易(Caravan trade)。商队首领即是政府代理人(Agent),由4位政府使臣辅助,并配有4位税官和100名由一个军官率领的哥萨克士兵。1693年,俄国第一个皇家商队携带价值41900卢布的皇家货物和价值113620卢布的私商货物前往北京。此后俄国商队每3年往华一次,先到北京,然后到边界城市尼布楚,在那里易货贸易,以皮毛交换中国的烟、茶和丝绸。1693-1730年间,共有13个俄国商队前往北京。在清政府允许可在北京进行贸易的50位俄国“使臣”中,只有三位是真正由俄国政府派出的。〔3〕(P22)每三年一次、每次商人总数不到200人的对华贸易规模远不能满足俄国商人的需要,而清政府方面则日益担心越来越多的俄国人出现在北京。1728年6月25日双方政府签订《恰克图条约》,恰克图被选为双方边界贸易地。

尽管沙皇政府在1731年和1734年重申垄断皮毛贸易的法令,但政府商队的低效能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贸易需求,到18世纪30年代,俄国私商对华贸易量已逐渐超过政府商队。1762年,俄国政府正式废除政府垄断贸易法令,俄国政府的商队贸易寿终正寝。〔19〕(P345)

三、恰克图贸易兴衰与山西商人退出茶叶贸易

1728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后,双方贸易迅速发展。此后约150年的中俄“彼以皮来,我以茶往”的边境贸易,几乎都在恰克图交易。

恰克图位于色楞格河右岸,北近贝加尔湖南岸,与俄国的安格拉湖(Angara Lake)、贝加尔湖与色楞格河水运体系相近,南距库伦数日路程,座落在两国界碑南北相距约一公里处,为库伦所辖。1730年以后,两国商人各自隔界建城,遥相对峙。北市为俄商聚居地,名为恰克图(Kyakhta)。南市为中国商人居住,称为买卖城,此名称一直沿袭到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的1920年。清代文献也统称南北两市为恰克图。

恰克图边界贸易的第一个集市在1728年8月15日开张,当时只有10个俄商和4位华商参加。直到18世纪50年代初,恰克图贸易仍不景气。1737年,俄国商领兰格(Lange)在视察恰克图后给政府的报告中提到,“很多俄国商人如以往一样住在恰克图,带来很多俄国货物,但生意奇淡,因为没有几个中国商人来恰克图,来的人也没带来俄商想要的货物。因此俄商损失惨重。”1738年,西伯利亚总署会同伊尔库次克副总督知会中国边境官员,请他们派中国商人前来恰克图,因为中国商人不来,俄商货物屯积,损耗严重。〔20〕(P229)

阻碍恰克图贸易发展的原因主要在俄方的管制贸易体制。由于俄国政府垄断了中国商人所需的皮毛贸易,早期在恰克图出售的皮毛,大多是俄使商队从北京带回的剩货。1729-1730年,仅有23829卢布的皮货在恰克图出售,中国商人难以从恰克图的俄国私商购得所需皮货。其次,俄国政府还在1731年宣布,利润较高的中国货物大黄和烟叶仅能由政府商队采购,俄国私商不得私自向中国商人购买。第三,恰克图俄国私商被俄政府的苛捐杂税所累。俄商需向西伯利亚总署缴纳货物(包括现金)值的10%税收,尚不包括各种规费、罚款和杂捐。第四,货物在莫斯科的售价由西伯利亚总署规定。所有这些对私商的侵害使私商以走私方式来对抗政府的贸易管制,恰克图成为俄国私商主要的走私贸易中心。

然而,俄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与日俱增,远不是官方商队所能满足的。除了俄国欧洲部分对中国贵重商品的需求增加外,西伯利亚人口的迅速增加也刺激对中国大众消费商品的需求。到1745年,23个西伯利亚镇的人口增长到18.5万人,他们对中国的大众消费商品如烟叶、茶、

低档棉布、糖等都有大宗需求。18 世纪四五十年代,俄商走私贸易因此日益兴盛,而俄国国库却日益难以支撑效率低下且昂贵不堪的官方商队贸易。1744 年,恰克图的中国货物售量已达 287 500 卢布,多为俄国私商购买。[3](P44 - 45)

1755 年,俄国政府停派前往中国的商队,俄方对华贸易从此由私商经营。1762 年,俄国政府正式颁令废止官方商队对华贸易。从此,恰克图贸易进入繁盛时期,直至 19 世纪中叶。

表 3 1755 - 1850 年中俄恰克图贸易额(进出口合计)

年份	总额(卢布)	年份	总额(卢布)
1755	837 065	1769 - 1773(平均)	2 251 417
1785	3 611 852	1795	5 440 570
1805	11 484 656	1813	10 929 348
1826	12 284 738	1830	12 797 194
1847	13 601 120	1850	13 832 142

资料来源:Sladkovskii, p. 47, p. 53, p. 57, p. 61, p. 68.

在俄国出口中国的货物中,以皮毛为大宗,其次为皮革制品、俄国布和由俄国转口到恰克图的普鲁士、荷兰、英国的纺织品。这些商品占俄国出口中国货值的 85 %。此外,还有刀、斧、矛、金属器皿等杂货。早期俄国出口中国商品中尤以皮毛为最。越到后期,输华商品种类越多,皮毛所占比例有所下降。1700 年,皮毛占输华货值 4.7 万卢布的 81 %;1755 年占输华货值 60.5 万卢布的 70 %;1781 年占输华货值 180 万卢布的 65 %。到 1850 年,尽管中俄贸易已扩大数倍,输华皮毛的数量也大量增加,但仍只占输华货值 1383 万卢布货值的 33 %。[6](P344)此时俄国布和其他制成品已占输华货值的 50 % 以上。

中国输俄商品在 18 世纪末以前,以棉布为大宗。直到 19 世纪末,虽然俄国的纺织工业已很发达,东西伯利亚人仍偏爱中国布而非俄国布。中国棉布之后的大宗商品是丝绸。在 18 世纪中后期,丝绸约占中国商品出口总值的 30 %。到 19 世纪初,丝绸占输俄华货总值约 15 %。

19 世纪后期,俄国的轻工业迅速发展,对中国棉布和丝绸的需求下降,对茶叶的兴趣上升。在恰克图,中国茶叶越来越抢手。茶叶在 1792 年以后成为中国输俄货物的第一位,当年,茶叶约占输俄货值的 22 %;1802 年,这一比例已增加到 40 %。此后这一比例不断增加。1820 年,西伯利亚总督波兰斯基下令给俄国商人,在恰克图互市中扩大茶叶购买量。他对俄商说,“俄国需要中国丝织品时代已经结束了,棉花也差不多结束,剩下的是茶叶、茶叶,还是茶叶”。[7](P145)到 1850 年,茶叶出口俄国达 579.8 万卢布,占输俄总货值的 95.7 %。其中,白毛茶占 79.9 %,砖茶占 15.8 %。[3](P67)

恰克图贸易的迅速衰落始于 1862 年签订的《中俄陆路通商条约》。尽管 1858 年中俄签订的《璦琿条约》将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割让给俄国并准许互市贸易,但尚未对恰克图贸易造成直接的冲击。《中俄陆路通商条约》却使俄国正式得到深入内地购茶的特权乃至到内地建立茶厂。西方列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打开了中国通商门户,西方商人开始到中国内地购买所需商品。俄商沿英商之例,也深入到中国内地。早在 1850 年,俄商就私自到制茶中心之一的汉口购茶。汉口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后,俄商遂于 1861 年在此建立砖茶工厂。到 70 年代,俄商开始在福州制造砖茶。[9](下卷, P54)鸦片战争以后,福州逐渐成为制茶中心和输出茶叶的口

岸。俄商到福州购茶、制茶极大改变了中国境内茶叶输俄的路线。俄商所需的武夷茶原本由山西商人转贩加工,从闽北经江西、湖北往张家口的输俄茶叶之路改为从武夷山将茶叶沿闽江运到福州加工为砖茶,再海运到天津、再陆运经张家口运到恰克图的路线。由福州海运至天津成本低廉且快捷,原来山西商人越闽赣分水关从陆路翻山越岭运茶的生意自然难以为继了。到海参崴开港后,俄商利用海参崴海港发船,其轮船可达上海、江汉、福州等紧靠茶叶的口岸购茶、制茶,山西商人在茶区转贩输俄茶叶的盛况不复存在,恰克图贸易自难以为继。同治七年(1868年)八月恭亲王奕訢奏折中指出了关于恰克图贸易衰落原因是由于俄商自行到内地贩运茶叶:“从前恰克图贸易之盛,由于俄人不能自入内地贩运,自陆路通商以后,俄人自行买茶,不必与华商在口外互换,因之利为所夺;兼且道途梗阻,货物渐稀;商东又因湖北汉口等处屡次遭兵,资本荡然,将恰克图存本陆续提用,以致生理益绌。”[21](卷61, P6)

当俄商自行组织茶叶贸易后,张家口的山西商帮也随之凋零,原来的百余家山西商人到1880年间,仅剩20余家。随着列强对中国主权的逐步蚕食和洋商在华特权日增,华商优势逐步消失,被逐渐排除出从福建到莫斯科的陆上茶叶之路。到1900年西伯利亚铁路建成以后,俄商将茶叶水运至中国沿海各口岸,再海运到海参崴,再经西伯利亚铁路运输到欧洲。欧亚陆上茶叶之路的主线无需再经中国境内,原先俄国商队从恰克图到莫斯科需行16个月,现借铁路只需7周。俄商利用在华商务特权在中国茶区购茶、设厂、制茶,以轮船、港口和铁路优势,不但独享输俄华茶的收购、制作、运输,甚至“俄茶倒灌”,俄商取代华商,在中国南方贩运茶叶倾销于新疆满蒙的广大地区。诚如1911年理藩院奏折所言:“蒙古商务,向以茶为大宗,理藩部例有请茶票规,为大宗入款。近来销数顿减,不及旧额十之三四,实因西伯利亚铁路交通便利,俄茶倒灌,华茶质低费重,难与竞争。”[22](卷53, P961)

18世纪至19世纪末期的陆上茶叶之路从福建北部的武夷山区延伸到莫斯科,全程超过四万五千里,以恰克图为中心,皮毛与茶叶是这条贸易大通路的主要互市商品。在19世纪中叶以前,这条贯通欧亚的陆上茶叶之路的贸易一直由山西商人主导,正如18世纪至19世纪40年代广州行商主导广州至欧美海上茶叶之路的茶叶贸易一样。随着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以武力推动对华商务扩张,外商在华享尽各种特权,华商优势荡然无存,在与外商竞争中纷纷败北。正如执广州茶叶贸易牛耳的广州行商被鸦片战争的炮火彻底扫荡一样,执塞外贸易之牛耳的山西商人也不得不退出对俄茶叶贸易,茶叶之路与茶叶贸易不得不拱手交给以沙皇政府为后盾的俄商。国势弱,商势衰,陆上茶叶之路与海上茶叶之路的结局如出一辙。

参考文献:

- [1] EARL H. PRITCHARD. *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750 - 1800* [M]. Washington, 1936.
- [2] DENYS FORREST. *Tea for the British: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a Famous Trade* [M]. Chatto & Windus, London 1973.
- [3] M. I. SLADKOVSKI. *History of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M]. Jerusalem, 1966.

关于俄茶倒灌,参见蔡鸿生:《“商队茶”考释》,《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关于海上茶叶之路贸易的研究,参见:庄国土《广州制度与行商》,《中外关系史论丛》第5辑,北京文献书目出版社,1996年版;《从丝绸之路到茶叶之路》,《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

- [4]J. F. BADDELEY. *Russia , Mogolia , China* , vol.2[M]. London 1919.
- [5]曹仁虎,等.清文献通考:卷 10[M].上海:上海鸿宝书局石印本,1902.
- [6]C. M. FOUST. *Muscovite and Mandarin : Russia 's Trade with China and Its Setting* , 1727 - 1805[M].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Chapel Hill ,1969.
- [7]瓦西里 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A].卢明辉.恰克图买卖城中俄边境贸易的兴衰变化[A].中外关系史论丛[C].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
- [8]CHINESE REPOSITORY[M]. 1845 , vol. 14.
- [9][英]乌克斯.茶叶全书(上)(下)[M].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49.
- [10]茶人.两湖茶的过去和现在[J].中国茶讯,1957,(3).
- [11]王彦威辑,王希隐编.清季外交史料:第 24 卷.北京:王希隐自排本,1932.
- [12]贾桢,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66[Z].北京: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30.
- [13]何秋涛.朔方备乘:卷 37[M].1881 年石印本.
- [14]魏源.海国图志:卷 83[M].成都:巴蜀善成堂本,1887.
- [15]左承业.万全县志:第 4 册.卷 50[M].乾隆十年刻本.
- [16]李延寿.北史:卷 15.列传 3[M].北京:中华书局版,1974.
- [17]刘选民.中俄早期贸易考[A].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Z].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8]林馥泉.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Z].永安:福建省政府统计室,1943.
- [19][俄]尼古拉 班蒂什 - 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件汇编(1619 - 1792)[Z].中国人大俄语教研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20]SYCHEVSKII. *a Historical Note Concerning the Chinese Border*[M]. Moskva ,1875.
- [21]贾桢,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61.北京: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30.
- [22]宣统政纪[A].清实录:第 53 卷[Z].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
- [23]蔡鸿生.“商队茶”考释[J].历史研究,1982,(6).

[责任编辑:陈双燕]

Land Route of Tea from North Fujian to Moscow: a Study of Tea Trade with Russia before 1850s

ZHUANG Guo - tu

Abstract : Tea trade had been the main source of profit for the western merchants engaging in trade with China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There were two routes of Sino - western tea trade , one by sea and one by land. The land route mainly aimed at the Russian market and it went as long as 20000 km from north Fujian in China to Moscow. Kyakhta , a town on the border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became the centre of tea trade from 1730s to 1850s. The Russian caravans and the Chinese merchants engaged in barter trade with China tea for Russian pelts. The Chinese merchants from Shanxi , who dominated north China 's trade , controlled tea trade route on the Chinese side. After obtaining same commercial privileges in China as other westerners as the result of the Opium War , the Russian merchants expanded their control to the inland China. Just as the monopoly of tea trade in Canton by Hong Kong merchants was uprooted after the Opium War , the Shanxi merchants lost their control of the tea trade with the Russians and they gave up the role as the main tea supplier to the Russian market.

Key words : Wuyi mountain , Moscow , tea trade , Shanxi merchants